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1/4 字数 139,000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3,000

统 一书号：11072·50

每 册：0.6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 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湛小岑 (1)
- 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孙越崎 (27)
- “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潘世纶 (34)
- “五四”运动回忆片断 (三篇)
- ……………管易文 魏士如 凌勉之 (44)

*

*

*

- 杨以德其人……………夏琴西 (54)
- 徐世昌出任总统之前前后后……………谢宗陶 (66)
- 徐世昌的晚年生活……………叶刚侯 (91)
- 掠夺井陘煤矿的汉纳根……………高渤海 (97)
- 巧夺诈取致富的泰莱梯……………高渤海 (106)
- 利华大楼与骗子手李亚溥……………刘文清 (115)
- 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被逐始末……………岳树德 (130)
- 狄克逊是怎样逃离天津的……………刘清芬 谢纪恩 (152)
- 天津英美烟公司的经济掠夺……………肖祝文 (166)

回忆天津“五四”运动及“觉悟社”

谌 小 岑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并焚烧了亲日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从而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大中学校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有各地的工人和其它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参加，展开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大运动，史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协约国成员之一的资格企图以占有德帝国主义在山东省攫取的路矿权利作为跳板，并向袁世凯卖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进而独占中国为殖民地所引起的一次全中国人民共起抗拒侵略斗争的伟大爱国运动。在中国反帝斗争革命史上自有其特殊地位。后期并因此而转变成了一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普遍革命行动的新的开端。这就是“五四”运动之所以值得特别纪念重视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四”运动的这一伟大历史意义，在天津的活动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来。

(一)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洋大学冶金班的学生，当时一直想

“注意重工业”的建设来富国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也派了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居然依照日本的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青岛的租借权、胶济铁路以及沿线矿产资源的开采等，在对德和约中写成三项条文，转给了日本，要中国签字承认。消息传来，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坚决反对。五月四日，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口号：“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的示威运动，在天津引起了共鸣。

五月六日上午，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学生谌志笃来找我。我们一九一六年曾在高等工业学校同学一年，加上同宗的关系，因此很熟识。

我把他介绍给高年级的同学，讨论了如何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问题。

谌志笃的原意，是想推北洋大学的同学出来主持天津的运动，因为天津只有北洋是个大学。后来，因为北洋毕业班同学要进行毕业考试，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有顾虑，又由于北洋大学远在西沽，离市中心太远，联系上不方便，几个学校的同学代表商议的结果决定，以水产学校和高等工业学校作为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会址，五月十四日正式宣告成立。推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代表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即韩麟符）为副会长，下设各科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另由各校代表一人组成评议会，决定五月二十三日举行罢课。

接着，在五月中旬和下旬，又接连举行了几次示威游行，强烈要求罢免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汉奸官吏、收回山东主权、否认“巴黎和会”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与此同时，有几个学校还分别出版刊物，开展了文字宣传工作。

《北洋大学日刊》围绕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学生何罪，爱国其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论点，发表过几篇社论，在群众中反应强烈。

这期间，第一师范、第一中学也出了日刊。

(二)

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宣告成立。这个团体是以第一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和同学为主体的，还有中西女中、严氏女中、普育女中、贞淑女校等校的学生和教职员，以及几位教会的妇女活动家参加。她们在西北城角等处设立有讲演台，进行爱国宣传活动。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天津各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参加的有天津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团体及人士。

天津是华北一个进出口的大商埠，商会的活动对抵制日货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许多商店的青年店员，斗争情绪极高，督促检查各商号制订抵制日货的办法，行动十分活跃。

六月十日天津商会罢市。天津和塘沽的码头工人拒绝起卸日货，天津三个火车站（总站、东站、西站）的铁路工人一齐罢工，天津“五四”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

(三)

六月五日，是天津学生运动开始进入高潮的一天。

在学生联合会的统一布置下，十五个大中学校的学生近万人，于一早就齐集在南开中学前面的广场，举行了宣誓仪式，准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并向省长公署请愿，提出否认“巴黎和约”条文、废除“二十一条”、罢免卖国贼、全面抵制日货等要求。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直隶省长曹锐派来的武装军警的阻止。军警们说：“奉了大总统的命令，禁止学生游行。”学生们坚持不散。几经交涉，直到下午，才允许推出马骏等代表四人去见省长曹锐。代表们离开南开广场后，近万名学生与武装军警继续坚持斗争。

马骏等四位代表去见曹锐。他们经过大胡同时，看见省长公署前面的金钢桥吊起，以阻学生游行队伍过桥，足见当时军阀当局的恐慌。学生代表见到曹锐后，他对代表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电请政府收回山东权利，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罢免卖国贼等）拒不作答，反而要求学生即日复课，不准上街游行，更不得有损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随后甚至破口大骂，胡说学生示威游行会造成天津地方糜烂、日本海军登陆、引起战祸的种种危险。代表据理力争，坚持“不达到罢课的目的，决不上课”。后来知道，曹锐对学生代表一派怒气冲冲的言词，是在他出见学生代表之前，日本总领事见他时所提出的恫吓之词的反应，足见这个卖国政府省长的可耻可恶的嘴脸。

这时，在南开广场坚持斗争的广大学生，在下午四点多钟，终于冲破了武装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地走向了街头。由南开广场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直奔省长公署。当时有几百名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的队伍，排列在省长公署辕门前，声援到来的游行队伍。

在省长公署内的谈判相持不下，教育厅长王章祜设法解围，对马骏等代表们说：“学生队伍已到东辕门了，你们去看看吧！”代表们遂退了出来。这时，天色已经快黑了，学生队伍开到黄纬路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马骏对大家说：“省长要我们明天上课，我们说学生罢课的目的一项也没有达到，决不上课！现在上海已经罢市，我们有责任促使天津商界也罢市。”

(四)

六月六日早晨，各学校门前都驻扎了武装军警，并贴有一张警察厅长杨以德的告示，内容大意是，“奉大总统明令，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散布传单”云云。门禁森严，学生单独也不准出入校门。

六月七日，个人只要没拿旗帜和传单，可以自由行动了。晚上，各校学生代表便在法租界新学书院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于八日下午一时在东马路基督教青年会附近集会，然后结队游行。

队伍分作两部份，一部份到省长公署，一部份到警察厅，要求省长曹锐、厅长杨以德书面答复为什么要禁止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召开公民大会。

这次行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曹锐被迫允许学生在讲演所讲演，并同意六月九日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

(五)

六月九日的河北公园公民大会是成功的。掀起了天津人民

的爱国热潮。

当日，河北公园由于学生联合会发动大批学生经过彻夜布置，显得整洁严肃。会场中心悬有大幅标语，上联为“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为“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下午一时开会，到会的公民达两万多人。学生联合会代表马骏首先宣布开会理由，大意说：“我们‘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已一个多月，全国人民热血奔腾，抗议呼救，但至今卖国政府在国际外交会议上还未拒绝签字，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至今还未罢免惩办，他们都是官官相护，一鼻孔出气，要想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只有靠我们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奋斗到底。……”接着被邀的各界代表，包括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天津人民团结起来，收回山东权利，否认“巴黎和会”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条文，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群起抵制日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会后，学生联合会率领到会群众组成队伍到天津商会，要求天津各商店于六月十日响应上海商会的号召，举行罢市。商会负责人被迫答应了学生们的请求，连夜发出了通告，号召全市各商店实行罢市。

(六)

商店罢市的消息，吓坏了天津军阀当局。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对商会的负责人说：“如果商店罢市，警察就要罢岗，这样市面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了。”妄图以此来恫吓商会，阻止商

会罢市。

学生联合会连夜筹谋对策，决定由各校的童子军和学生分会分区负责站岗，维持市面秩序。结果，商店罢市的这一天，市面上虽行人众多，熙熙攘攘，但并未发生任何破坏事故。

北洋大学同学负责北大关以北街道的站岗任务，每二小时换班一次，同学们站岗时，手中拿着一根棍子指挥车辆、行人，市面上秩序井然。

这样的行动使北京卖国政府感到十分恐慌。他们连夜派人来津，威胁利诱，许以罢免几个负责对日外交的官员，要商会停止罢市。

天津因有外国租界关系，不少商人与外国商人有所勾结，尤其是日本的轻工业产品充斥天津市面，一些买办、奸商从中获利很厚，因此，他们也极力破坏罢市运动。

罢市一天，商人不无损失，六月十一日便又开业。但是，商会中也有一部份爱国商人，经学生联合会说服教育的结果，六月十二日有一部份商店再度罢市。

由于这次行动是全国性的，铁路工人以及全国各地工厂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一连三天的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行动，迫使北京军阀政府明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亲日汉奸的职务。

三个卖国外交官员的罢免，虽然算是这次爱国运动的一次胜利，但是抵制日货、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否认“巴黎和约”条文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曹、陆、章三个人负责对日外交，直接同日本人打交道，以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换取日本源源供给贷款来维持这个腐败不堪的卖国官僚政府，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他们三个人

的企图也就是整个卖国政府的企图，他们之被罢免，不过是充作替罪羊罢了。

(七)

青年学生的头脑是清醒的，大家都认识到北洋军阀政府不推翻，中国没有挽救的希望。因此，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并未因曹、陆、章的免职而中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就采取了一个恶毒的阴谋，于六月中旬密令各省市教育厅转各大中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让家长们把学生接回家去，想借以瓦解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

在当年，能够到大、中学校读书的人，大部份属于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子女。在家长的督促下，不少学生果然回家去了。这对天津学生联合会在事实上确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学生会的骨干也大半走了。

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谌志笃，是贵州人，他看到还有一些远地的学生没有回家，于是采取了一个对策，邀集各学校留校的学生会负责人集中到南开中学办公。

在这一号召下，我们《北洋大学日刊》的编辑、经理有五个人也搬到了南开中学。《北洋大学日刊》是北洋大学学生会在罢课后出版的，我一直是该刊的经理兼记者。六月十日，全市罢市、罢工，马路上挤满了人。我们的刊物本来只印一千份，后来增加到三千多份。十日这天，我带着一卷报纸在东北城角官银号附近卖报。报纸的定价本来是每份一枚铜元，可是不少人给我一角或两角的小银币不要我找钱。还有一个人竟给了我

一枚银元。当时人民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情，使我非常感动。这天的报纸一直印到傍晚才停，一共销了两万多份。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永远不能忘的：

当时，除《北洋大学日刊》外，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也出版了刊物。三个学校刊物的记者经常集合一起，共同行动。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在西北城角一带的小商小贩、人力车夫住宅区搭了一个讲演台，每星期在那里举办三次讲演会，听众都是些老老少的妇女，秩序很好。

我们三个校刊记者曾多次到那里采访，招待我们的是当时只有十六岁的邓文淑（即邓颖超同志）。她每次对我们都是热情接待，临散会时，总是要我们对她们的讲演会提些意见。起先，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番客气话，并未重视，后来，由于她一次比一次的更加诚恳、严肃、谦虚的态度，使我们不好意思起来。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位年轻的女学生对我们的要求是真诚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唯唯诺诺地敷衍一番完事。经过几度商量，在她第四次向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就把我们的共同看法，诚恳坦率地告诉了她。大体上，提了这么三点意见：

第一，女界爱国同志会费了很大的气力搭起了一个讲演台，又难得召集到几百上千的妇女前来听讲，应该趁此机会，放宽讲话内容的范围，不要局限于抵制日货一个题目；

第二，关于男女平权，送女儿上学，放足（当时我们看见十几岁的姑娘们还是有缠足的）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着重宣讲；

第三，可以组织几个访问团，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同她们拉拉家常，看看她们在家里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邓文淑向我们表示了热情的感谢。在第五次的讲演会上，讲话就增加了新内容，在群众中反映很强烈，为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八)

大约在六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几个《北洋大学日刊》的负责人搬到南开中学的时候，谌志笃看见了我，约我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会计科长。

宣传科的同学们编印了一期《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谌志笃看到内容贫乏，不让发行。他约我到基督教青年会去见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南开同学。他说，已经同这位朋友见过一面，要我一同去同他谈谈。

谌志笃约我去见的的朋友，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这位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当时只有二十一岁。他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就去了日本，这次是特为天津的学生运动回国来的。

在初次见面时，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魁梧奇伟的身材，谈起话来也不是那么慷慨激昂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但是，显得那么沉着实在而有力，那么和蔼、诚挚、可亲。

谌志笃这次找他的主要目的是请他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于七月二十一日出版了。最初是日刊，后来改为三日刊。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行达二万余份。

周恩来在发刊词上提出了“革新”和“革心”的主张。“革

心”就是“改造思想”，“革新”就是“破旧立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这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着眼的宏伟目标。

从此，周恩来就成了天津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

(九)

“五四”运动是以山东问题为导火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青岛以后，又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济南车站即驻有日本兵，济南也成了日货倾销的市场。

山东，特别是济南的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在济南举行过几次示威游行，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等口号。运动一天比一天激昂。山东的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怕开罪日本人，引起冲突，竟在八月初对学生爱国运动实行武力镇压，命令军警开枪打死打伤爱国群众多人。因此，济南学生联合会特地派代表来天津请求支援。

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派遣大批同学到北京示威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马良。

从八月二十一日起，天津学生开始分批向北京出发。二十三日下午抵达北京的天津学生将近千人，会同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逮捕了几十个同学，三千多学生围住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相持不下。北京政府又动员两千多武装军警将学生包围，企图驱散学生队伍。

京津的三、四千多学生，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的领导下，同军警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马骏的指挥使得这群军警毫无办法。他常用声东击西、突破一点的办法，弄得军警狼狈不堪。

黄昏时候，北京反动当局特别又从南苑调来几千武装兵士，由一名高级军官负责指挥，将学生队伍包围起来，把学生逼近天安门广场。

军警看出指挥学生队伍行动的是马骏，便派了几十名士兵将马骏包围起来，将他逮捕。然后又用棍棒驱散群众，把学生和群众赶出天安门。

这次斗争相持到二十八日午夜，才算结束。

这件事引起北京、天津、济南以及上海等地舆论的强烈抗议，一致要求北京军阀政府立即释放被捕代表，指责北京政府残暴、无耻。

天津在京的学生和北京学生并未停止斗争，而是天天继续在市内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要求释放马骏和被捕学生。

据说，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有人主张枪毙马骏，但又怕这样一来将徒然促使全国学生运动的更加激烈。结果，在八月三十日不得不将马骏和所有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出来。后来，我们“觉悟社”的社员们都把马骏叫做“马天安”。

(十)

自从六月下旬以后，我负责天津学生联合会会计科的工作。

八月二十四日，谌志笃要我携带款项到北京去办理天津在京学生的后勤工作，安排他们的伙食、住处等问题。大多数天

津去北京的同学都是自费买票的，有的住在亲戚家里，有的是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照顾下安排住处及照顾伙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人就住在西直门大街的天主教堂，她们都是自己出钱开伙。只有极少数几个天津同学受到学生联合会的接济。

八月三十日全体被捕的同学被释放出来以后，分批返回天津。最后有八个办理后勤工作的人是在九月二日下午乘坐一列客货混合慢车回津的。这一次慢车，给了我们一个一路谈论天津学生运动今后方针的问题的机会。

八个人当中，有五个女学生，三个男学生。其中女同学有郭隆真、郑漱六，男同学有特为到北京照料请愿同学生活的周恩来。

谈话的内容，最初集中在北京一个星期来的见闻和感受。大家都发现北京已出版几种介绍新思潮的期刊，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废除宗法礼教”和欢迎“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

所谓“德先生”就是“民主”，是从英文Democracy一字的译文而来；“赛先生”是“科学”，是从英文Science一字的译文而来。

大家都觉得北京的运动已经前进一大步了，天津极应急起直追。后来就渐渐谈到天津爱国运动今后的方向，认为应该把天津的学生运动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向上来。

这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周恩来写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有过这么一些含意。在谈话中他听到女同学中也觉悟到这个新的方向，就提议天津也出版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来推动天津的文化运动。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另外，第一女子师范的同学郭隆真、张若茗提出想把天津男女学校的学生联合起来，改组学生联合会，也得到大家赞成。

这一路上的谈话，便产生了天津男女学校同学合组的新学生联合会和由周恩来领导的男女青年合组的“觉悟社”。这在当时，都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十一)

天津的女子中等学校只有第一女子师范和中西女校等几个学校，而中等以上的男学校却有十五处之多，至于学生人数男生更是远远超过女生。但是在改组后的新学生联合会中，工作人员中女同学与男同学的比例却为一比三。第一女子师范的张若茗当选为执行部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当选为宣传科长；中西女校的同学也有不少人被推为干事。

经过两星期的酝酿和周恩来、谌志笃、马骏等做了具体的准备工作，“觉悟社”也于九月十六日在东南城角草厂菴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成立了。一共是二十人，十个女青年和十个男青年。女青年中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刘清扬、副会长李毅韬，她俩都是女子师范的毕业生，还有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各科负责人，邓颖超、郭隆真、郑漱六、张若茗、周之廉、张嗣婧及吴瑞燕等，都是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还有一个是中西女校的教员李锡锦。男青年有七个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其中五个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编辑潘世纶及外勤赵光宸、胡维宪、薛撼岳等，还有两人是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马骏和干事李震瀛，其他三个人是：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第一师范的学生关锡斌（一九三九年入党后改名为管易文）、北洋大学学生谌小岑。男青年的名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是“觉悟社”的领导者。每次开会大家